文 学 研 究

鲁迅体味魏晋文脉的方式

孙　郁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鲁迅在辑校魏晋文献的过程,发现了文脉中所蕴含的辞章隐秘。又从乡邦文献、名士语录、文章气韵中,捕捉了精神表达的各种可能。他所打捞的各类文字,刺激了学术思考和文学创作,将现实感带入到对古代诗文的凝视中。在打通古今的同时,又能从域外资源的参照里,建立起批判性思维,并以超俗的目光,矫正了京派学者的某些审美理念。

关键词: 鲁迅;魏晋;乡邦文献;京派

中图分类号:I 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1)05-0105-12

一

鲁迅欣赏魏晋文化,除了源于早期的读书经验外,也受到了晚清新的审美思潮的影响。周作人介绍道,他很早就接触了《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六朝文絜》等书籍①,留学日本后,也被章太炎等人的著述所吸引,对于桐城派之外的审美趣味别有心解。年轻时重视域外文学的译介,但也迷恋旧学里有意味的存在,曾长时间抄撮史料,在魏晋文献的校勘方面,用力最勤。此外,唐宋小说的搜集,成就不俗,只是明清文字的梳理较少,可能与他对于这个时期的文化评价不高有关。魏晋诗文,在其故土流传较广,遗迹也多,那些飞动的灵思有后来道学者所没有的美质。这里含有一定的审美元素,还有表述的特别,都丰富了辞章之学。鲁迅于此所得,非深味其文体者不能察之,那些远去的幽魂,多散落到其文笔之中了。

章太炎、刘师培对于魏晋文化的理解,打破了韩愈古文运动以来的文章理念,在桐城派遗产以外寻找精神资源,曾经启示了诸多学人。不过鲁迅与他们略有不同,除了小学功底外,有着考古的心得。不仅勘察旧迹,还抄录、整理大量的原始文献,有着一般人没有的批判眼光。他的工作可分以下几类:一是乡土资料,主要有《会稽郡故书襍集》《会稽先贤著述辑存》《会稽旧志》《会稽旧志草本》,内中有方志所遗漏的内容;二是文人作品集,现存有其抄录的《嵇康集》《法显传》《谢灵运集》等,作品有着不凡的辞章;三是古小说资料整理,代表性的有《小说备校》《古小说钩沉》,志怪、录异、志人之作丰富;四是金石类,此类抄件甚多,主要有《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录》《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名目录》等,其间不乏意外之思。这些对于鲁迅理解文学产生的背景,提供了有趣的参照。

魏晋是思想斑斓、诸多精神混杂的时期,因为儒家思想受到各种学说的冲击,读书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表达方式都略有变化。这些遗文,一些得之传世文献,一些来于墓志等出土资料。从墓志看世相,就有了与别的学者不同的结论。抄录类书的文字外,考释碑文,是鲁迅很注重的一项工作。像《范子计

收稿日期:2021-03-12

作者简介:孙郁,男,辽宁大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 世纪中国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建构与反思研究"(项目编号:20&ZD280)

① 周作人:《鲁迅读古书》"关于鲁迅",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5 页。

然》《魏子》《任奕子》《志林》《广林》《文士传》《虞永兴文录》都是从其他文献中打捞出来的。而一些人物事迹,则来自对墓碑的审阅,《会稽禹庙窆石考》《〈□肱墓志〉考》《〈徐法智墓志〉考》《〈郑季宣残碑〉考》《〈吕超墓志铭〉跋》都留下其研究心得。这些工作有条有理,文字质朴,看得出清代朴学之风对于他的不小影响。

多年间整理古人资料,自然矫正了诸多观念。像碑文与传记,是他一直注意的文本,在零碎的文献里,可以发现传世文献没有的片影。清末文人谈中古文学,已经注意到文化间的互动,陈三立就说:“其升降得失之故,盖与道术、政治、风尚相为表里。”①鲁迅在故土人士的影子里,关注的就是生活方式、文人心态、社会制度与文章之关系。这和陈三立对于古代文化的认识也有相似的地方,只是他注重的更多的是民间文献。可见,他的研究受到了当时风气的影响。从其整理的过程看,社会学所关注的内容,也被悉数勾勒,就内容来说,比一般的士大夫者流就多了驳杂的元素。

在所搜集的古代文献之中,辞章绚烂的文字有限,简朴平易的占了主流。这流露了他的基本审美态度,远华贵而近自然,亲平实而弃浮饰。《会稽旧志》是鲁迅用心抄录的故土人物简介,属于碑铭之类,所叙乃生平简历,无夸张,多直叙,词语多为短句,言简意赅,古风依稀可辨。1911 年 1 月 2 日,鲁迅致信许寿裳:“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 甚可悼叹。”②这可以解释他何以深入勾勒故土先贤资料的原因。《会稽旧志》有记战事者,有述谶纬之学的,也有文士交游之趣。这些人物旧录,显出彼时社会风向与价值尺度。比如《魏朗》一则,记其血性之态,文也来得,武亦高强,在官场不为俗语所囿,临危不惧,拒不受辱,以自杀身亡。《盛宪》写孔融关爱友人,恐才子盛宪被孙策所害,遂给曹操去函,力保天下英才。尺牍纵横笔墨,深情款款,政治风气的炎凉历历在目。由故土先贤命运,看文化流变之迹,鲁迅的感受之深,当可想而知。

一般人注意彼时的文人作品,多为名家,鲁迅却看重那些被渐渐遗忘和忽略的人物形迹。因为不再满足晚清学者对于文章的解释,遂有了移步文外的冲动。这与他翻译中的情形很像,那时很少翻译大家作品,而是介绍二三流的作家文本。在乡邦文献与野史里体察历史遗迹,审视问题的视角多了方法论的意味。他对于旧的遗产的这种态度,在学问方面丰富了认知世界的途径,在创作上,则衔接了远古的遗趣。那些旷远的悲凉和冲荡之气,也被其在白话文的体式里一一继承下来。

鲁迅的研究方法都很古朴,一是不同版本的对比,二是古书注疏的求疵,他自述:“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讹敓,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③在校勘之中,是有怀疑的眼光的,从不同版本觅出精神线索,对比、补正、勘误,认真的态度,延续了浙东学术传统。在《〈云谷杂记〉跋》中,鲁迅说:“唯讹夺甚多,不敢轻改,当于暇日细心校之。”④他的日记与书信记载了其间的辛苦,而所思所得,也流入文字之间。与许多同代人不同,使用的材料,并非都是孤本秘籍,也不做惊人之语。梳理各种史料,为小说史的写作打下基础,此外也萌生了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的愿望。我们从他校勘的《鲍明远集》过程里,能够感知其文字学的修养之深。

在整理大量文献的过程中,他显得格外兴奋。因为发现了文外之文与诗外之诗。对于文学概念的理解,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广义的看法受章太炎影响,凡著于竹帛的都是文学,也就是“杂文学”⑤,最初鲁迅不以为然,因为他理解的文学,是托尔斯泰与夏目漱石式的,这是狭义的观念,即“纯文学”。不过在整理乡邦文献与野史过程,寻找各类湮灭文字时,也印证了章太炎的看法。所以,古籍整理与翻

①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南昌: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0 页。

②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1 页。

③ 《鲁迅全集》第十卷,第 3 页。

④ 《鲁迅全集》第十卷,第 19 页。

⑤ 章太炎:《国故论衡》,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73 页。

译活动,使他往来于文与非文,诗与非诗之间,便获得了古风的滋润。许多佚文,叙事简洁,内含别趣。比如《南方草木状》,在自然间觅得清新,本草之意,天地之韵,爽目者不可胜数。《六朝墓名目录》里,远去的遗风犹在,可参之成诗者甚多,于思想不无洗涤之效。这些文献都不系统,在知识碎片里,却依稀感到古人心绪,字里行间亦带有感知万物的元气。

因了喜欢古人文章,而进一步探究古代社会的形态,也丰富了学术感觉。所以从诸多抄撮里,看出他不是限于狭小的文学观念里,而是有着更为广远的眼光。与古之学者的中古文学研究比,多了新康德主义的视角①。晚清学术里的朴学精神与现代人文精神交织为一体,由古而今,以近溯远,给新文学注入了新风。魏晋时代使其心动的是风俗、风气、风骨与风采。这便是古人所说的"知天下之络脉"②。当代学者将这些文脉梳理为多个层次,其中"乱世文学","生死主题、求仙主题、隐逸主题"的提出③,思路就来自鲁迅的启示。这和王瑶《中古文学史论》表达的逻辑一样,学到了鲁迅的真髓,已经不再是文章学体系下的文学史了。

二

从周作人的日记与回忆录可见,鲁迅抄写乡邦文献的时候,是得到周作人与周建人的一些协助的。文稿里就留下了两位弟弟的笔迹。而那时候周氏兄弟也热衷于民俗学的研究,兴趣在野史和民风的整理中。有学者早就注意到了鲁迅知识结构的变化,留学日本的时候,他随章太炎研究过《说文解字》,课余也阅读过大量的社会学著作④。而他对于科学思想史和浪漫诗学的学习与吸收,也催生了诸多思想体会。章太炎 1902 年曾翻译过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书中强调社会学注重"统计学之进步"和"因果律之通用"⑤,这些都是当时留学生注意过的著作。归国后,鲁迅自觉地运用了外来的理念,开始考察风俗。他辑校古籍,含有许多风俗的主题,从散逸的文字中寻找中古文化的蛛丝马迹,可谓用心良苦。故土文献的抄录,乃社会学理念的投射,与一般金石研究者和地方文献研究者的角度不同,其间日本柳田国男的影子也略可见到。

对乡邦文献发生兴趣,使他从故土的风俗、习惯、信仰、礼仪中,体味到文明的踪迹,一些素材纠正了先前文人对于历史的误解。在经学研究中,对日常生活的凝视是不够的,但那些不被读书人关注的只言片语,留下的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存在。人文研究脱离这些,其价值可疑。鲁迅在这个工作中,探寻到国民性的重要遗存。

社会学与民俗学进入自己世界的时候,古代文献就获得了丰富的意味。在所录的文字里,有许多背景性的信息,其中有关风俗类的,主要集中于《会稽先贤著述辑存》里;还有的是记人物的,《会稽旧志》则从《晋书》录得人物纪要多种;再则是描绘地志、山水之貌,《会稽地志》《会稽记》等所述山川河流之态,风景大可悦目。魏晋文人记叙此类遗风,不乏情趣。这些抄录的文字,比日本作家笔下的民间风情不弱。那时候周作人正在提倡民俗学,从日本柳田国男的著述中获得启示。对比周氏兄弟与柳田国男的著述,其间有相似的地方。柳田国男《远野物语》《日本的昔话》就多记山野之趣,描绘古风余脉⑥。民俗学要研究的就是此类谣俗之风。鲁迅在《〈会稽郡故书褋集〉序》也说:

---

① 参见孙郁:《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康德之影》,《扬子江评论》2019 年第 5 期,第 5—12 页。

② 黄庭坚:《答王子飞书》,《黄庭坚全集》第二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67 页。

③ 《袁行霈文集》第八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0 页。

④ 鲁迅对于社会学著作的了解,可以在早期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的引文中看到一二。

⑤ 《章太炎全集·译文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2 页。

⑥ 周作人在《我的杂学》里谈及柳田国男《远野物语》对于自己的影响:"我们对于日本感觉兴趣,要想了解它的事情,在文学艺术摸索很久之后,觉得事倍功半,必须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才有入处"。参见《周作人文类编》第七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2 页。

是故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其所造述虽多散亡,而逸文尚可考见一二,存而录之,或差胜于泯绝云尔。因复撰次写定,计有八种。诸书众说,时足参证本文,亦各最录,以资省览。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①

周作人对于这一部分内容十分喜欢,他的民俗学意识就聚焦于此。不过鲁迅不是把这些落实到学问的表述里,而是融于写作中。这很重要,他很看重古人对于故土山川水文的描述。郦道元等人的文字名气很大,作为文章典范为人称道。鲁迅在《众家文章记录九种》目录中还有《顾恺之晋文章记一卷》,抄过顾恺之的生平史料,自然也阅读了他对于会稽山美景描述的句子,那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②,气象上是深广的。古书里对于顾恺之的记载甚少,鲁迅搜集过程中的心绪,从字迹里也可揣摩一二。顾恺之的绘画对于六朝山水的描摹有浙东文化的影子,而其灿烂的想象和飘逸的神思,与曹植、阮籍、嵇康的文本比,都是相得益彰的。他与郦道元的体悟与感觉一样,是笼有天地之气的。

故土的礼俗,蕴含着不小的学问,鲁迅对此也很有兴趣。贺循所著《会稽先贤著述辑存》,收有《丧服谱》《祫祭图》《丧服要记》等文,作者文字简要精炼,所记古礼颇有分寸,儒家的等级制依稀可见,基本上延续了《礼记》的某些思想。丧礼以宗族的长幼之序分之,男女有别,层次分明。家族有一套道德法规,如有越轨之举,则被宗族处之。这些记录,都是社会史的边边角角,对于认识古人颇有意义。贺循笔下的会稽葬礼仪式,样式多种,让人不忘的是各种祭品、器皿的摆设与颜色,很有一种画面感。祖庙、屏风、壶、灯、神座等,都看出了彼时的风气。化古礼之繁重变为简而易行,也是贺循注意的,他的看法也体现了晋人的某种观念。魏晋时期的浙东,丧仪中人神悉尊,到了明清,已有了变化。张岱记载越人的扫墓,就有审美的意味,“厚人薄鬼”了③。这个变化,周氏兄弟是看到的。其实,千百年间风俗处于流动之中,晋侍中庾纯就在西晋的丧服制中发现了与古风的不同④。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里也关注过类似话题。从礼俗中看社会心理,对于理解文化的变迁之迹,都是不小的参照。周氏兄弟对此的感受,可能比同代作家更为深切。

除了南方风俗,鲁迅对于北人的民风也十分关注。这与社会学与民俗学关于地域决定文化的理论的暗示也不无关系。他搜集的北方图片、资料,为数不少。所藏的河北《凝禅寺三级浮图碑》,河南《怀令李超墓志铭》《道兴造像记》,在气象与风格上不同于南方,这是给他许多深的印象的。《颜氏家训》就说:“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若不修书,则过节束带以申慰。北人至岁之日,重行吊礼;礼无明文,则吾不取。”⑤燕赵地区,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其复仇与雄浑之气,鲁迅都十分赞佩。他抄录的诗歌,有的就是北人作品,其峻急之风都不可多得。后来在论述南人与北人的时候,这些阅读经验多少也影响了他,曾说,东晋迁都建安,其实带来了文化的差异,腐败也出现了:

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

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就带来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⑥

---

① 《鲁迅全集》第十卷,第 35 页。

②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③ 张岱:《陶庵梦忆·越俗扫墓》。

④ 参考吴承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吴承仕文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1984 年版,第 15 页。

⑤ 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第六》。

⑥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 457 页。

魏晋经验对于他后来判断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启示。从多年研究的结果里发现,古代中国有一个文化的生态,各地的风俗不同,方言有别,辞章也路径不一。我们看在《汉文学史纲要》里对于古代诗文与时代、地域关系的把握,都与先前的辑录工作不无关联。而他的文章里的悠远、雄浑之气,得之于魏晋风度,是谁都看得出来的。至于他的小说与散文中的故土风情,既来自乡邦文献的暗示,也有民俗学理念与现实感受的辐射。在作品里活化了历史之影,又在现实中叠印了西学的元素。周氏兄弟在民初积极提倡以民俗学的观点打量历史遗迹,在他们整理乡邦文献的过程,主张的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能够分析文学的成分,探讨时代背景,个人生活与心理动因"①。如果我们不看到整理国故过程的西学因子,那对于他的理解可能就简单化了。

三

近代学者回望魏晋时代,每每于玄学与佛学纠葛不已,从中看出文化转折的痕迹。章太炎、谢无量、汤用彤不乏这类思考。鲁迅对于玄学、佛学也有所兴趣,他从文人笔记中就觅出诸多思想隐喻。相对于玄学,他更关注故土文献的佛教元素。但他并没有去研究主要佛学家的著述,就藏书和辑校来说,所看重的是佛教传播和玄言里的诗文流脉,而这些经典多以魏晋时期为多。他自己就购置了《佛说百喻经》《痴花鬘》《阿育王经》《佛般泥洹经》《付法藏因缘经》《阿育王譬喻经》《众经撰杂譬喻》《出三藏记集》《弘明集》《广弘明集》等。还抄录了阮籍、嵇康、谢灵运等人的诗文。这些书籍是他进入彼时精神世界的重要参考,所得的结论也多别于同代的读书人。②

东汉以后的文化风气里,佛教传播改变了文人生活,对于文学与艺术的影响显而易见。鲁迅亲自抄录《法显传》,留下的文稿达 39 页之多,由此可以看见佛门的精神形影。《法显传》是一本远游求法之书,作者法显系东晋时期著名僧人。全书自叙域外跋涉经历,文字古雅、清隽,带出珍贵的佛教遗风,所叙访问异邦曲折故事,人文风情历历在目。文章的片段已经有小说家的韵致③,鲁迅欣赏它,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在抄稿里留下大量批注,多是字句的核实和句式的斟酌心得,看得出用力之深。佛门的文字对于辞章的演进和书写的风气是有促进作用的,这是研究文章之道的人不能不了解的部分。

佛经翻译对于文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魏晋时期的许多译本,给鲁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自己翻译域外文学,不肯用流行的白话,注重辞章的涩感、互文性和隐喻性,都有向鸠摩罗什致敬的意思。佛经翻译如何刺激了辞章的生长,是鲁迅最为关注的事,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回答梁实秋关于翻译问题的质疑时,就引用了汉译佛经的文本经验,指出硬译乃改变国人的书写习惯④。从古代文脉演进中体悟到创造新辞章的可能,这就为白话文学翻译实践提供了某些镜鉴。

自然,鲁迅注重佛经,还由于其精神里的隐含有创造性的想象。自从印度文化进入中国,艺术表述的空间就扩大了。他在为友人王品青《痴华鬘》写的题记就说:

>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颇加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具名《百句譬喻经》;《出三藏记集》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⑤

鲁迅对于佛经不是信的态度,而是如何化其精神,成为自己的生命的新的表达。古代的许多诗人,

---

① 周作人:《神话与传说》,《周作人文类编》六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 页。
② 《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2),鲁迅博物馆编(内部资料),第 47 页。
③ 《王运熙文集二·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86 页。
④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四卷,第 204 页。
⑤ 《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3 页。

都能出入佛学,于辞章里有变调之美。他认为“除去教诫,独留寓言”①的态度是好的。所搜集的拓片就有许多有趣的主题,其间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后来与青年木刻家也言及佛教艺术对于中国绘画的参照意义,也是深染于各类文献的一种心得。

魏晋的文学里,玄言诗颇有市场,与佛门艺术有了很大的区别。玄言诗受到老庄的影响,一些人的文章也带有此风。他欣赏的孔融、嵇康这类文人,尤其是嵇康身上的老庄之气,鲁迅身上未尝没有。王瑶先生说:“魏晋是文人由俳优进入士大夫地位的开始,由于老庄思想的兴起,文学的观念比较清晰”。② 这个风气的出现,使文章充满了灵动之气。但其间也并非一成不变。他说自己厌恶身上的庄周、韩非子毒气,那也有寻觅新风的冲动。而那时候一些诗人是渐渐摆脱了时风影响的。比如他抄录的《谢灵运集》《柳恽诗》等,也是扭转时风的作品集。谢灵运的山水诗,折射出士夫的思想的变迁,将玄言诗的晦明不已变为清纯冲淡之音,佛学意识被转换为中土妙思。柳恽的多才多艺,乐府之韵,常有奇句出来。整理他们的诗作,也未尝不是考察彼时学风与诗风之关系。有学者就指出,谢灵运诗作也受到禅风的冲击,但已经不易从中看到了③。这种“融合玄释”的笔法,导致了辞章的演化。④ 作家审美的深度埋伏,需细心者方能得之。鲁迅对此的体悟,比同代的许多文人要深。

从佛教的意蕴到老庄的思想,刺激了乱世里的文化生长,鲁迅由此相信文无定法,创造性的可贵。他欣赏的文章有许多被《文选》遗漏了,选家的文本给人以错觉,仿佛文学史是凝固的。这是以“文本为本”的思路的限制,而以“问题为本”则不易出现这类判断。⑤ 刘师培讨论魏晋文章时,也看到了彼时风气的变化,不是在模式化的批评中看待历史,他说:“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⑥ 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所以不满意施蛰存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因为是把古代经典作为凝固的存在接受起来,而他强调的是如何在文脉里发现思想的创造性。

在审视历史遗迹的时候,也有意外的惊叹,常发现士大夫的问题。面对中外经典,深入其间有创造性表现的,毕竟人数有限。鲁迅在法显那里看到了信念的诚的一面,但也从清谈者的文字中,注意到了借用经典的自饰者。他在给许寿裳的儿子开列的书单里,就推荐了葛洪《抱朴子外篇》,希望注意“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⑦。《抱朴子》对于社会风气的嘲讽时可见到,对于知识人的俗弊,一针见血。尤其是“追逐时尚,失去原则”⑧,乃一种浮躁之病。鲁迅对于彼时儒生的精神多面性的认识,显然也受此影响。后来在《吃教》一文中就说道:

> 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⑨

这也是“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⑩的感觉的再现,德国的尼采善于从明中见暗,鲁迅也传染了这个思

---

①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 103 页。
② 王瑶:《中国文学:古代与现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6 页。
③ 陈允吉:《东晋玄言诗与佛偈》,《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第 109—116 页。
④ 缪钺:《诗词散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8 页。
⑤ 这个观点受到赵汀阳的《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的启发,在此致谢。文章刊发于《哲学研究》2020 年第 7 期,第 3—19 页。
⑥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98 页。
⑦ 《鲁迅全集》第八卷,第 497 页。
⑧ 顾农:《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78 页。
⑨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 328 页。
⑩ 《鲁迅全集》第二卷,第 207 页。

维习惯,他自己从历史旧影里也形成了类似感知逻辑。所以,对于远去的文化,要寻找有个性和原创的元素外,还思考知识界悖论的一面。新思想传来的时候,得其真髓者总是少数,附会与“吃教”者是常有的现象。也因之,审视历史旧迹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求真的同时,也不乏“疑”的眼光。比如在面对孔融与曹氏父子的时候,说的都是多重的面相,一方面礼赞了彼时文人的个性的生长,另一方面窥见那些扭曲的词语空间,持论的切实说明了感知的立体。鲁迅的这种认知逻辑,同时存在于他的小说、杂文间,不妨说,这些既来自古人的暗示,也是西方近代哲学求异思维启发的结果。

四

显然,鲁迅对于古代文化中非温吞的、叛逆的精神是十分欣赏的。在回望古代的风俗、风气的时候,最吸引他目光的是诗文中表现的风度。这里有着青年时代的摩罗精神的回响,可以说西洋的个性主义这个参照,使他发现了消失的遗产。魏晋文人让人心跳的恰是逆俗的烛光,它才是灰暗王国里可以驻足流盼之所在。在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里,知识人的风度被描述得颇为动人,语态里多卓识的闪动。这里风度是主词,文章、酒、药还在其次。可见,鲁迅对于精神风范的看重,是高于辞章之学的。那篇讲演谈到许多有个性的文人,其中对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的勾勒很是传神,词语中的赞赏之意,弥漫在言谈之中。而对于曹操的点评和曹植的品味,也多妙语,是知人论世的表达。在对那个时代的文学的理解中,不是从文本到文本,而是从人与时代关系里思考审美,这是鲁迅的特别之处。他抓住了“药”与“酒”两个关键词,由此看觉醒的文人的逆俗之气,名士的风度也翩然而至:

>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①

服药与喝酒,不过一种精神放逐,讥讽礼教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的诗文对于鲁迅来说,有真魂的冲击,故每每引用,则取高远韵致之语,辞章也灿灿然有荡魂之意。彼时许多文章,没有迂腐的气息,鲁迅对于巧饰的文字不感兴趣,倒是对于质朴的、超迈的表达多有敬意。自建安体出现,新风渐出。“建安文学者,总两汉之菁英,导六朝之先路。”②而到了嵇康、阮籍,疾虚妄的意味多了,思想有了放荡不羁的一面。鲁迅被那时的文章吸引,不是没有道理,这些恰是桐城派文人最为缺少的元素。

东汉末年之后的文化走向,使审美蕴含了新的可能,鲁迅对于雅俗之变和台阁、山林之风都有特殊的理解。在对彼时风气的描述里,勾勒了知识人的群貌。何晏的洒脱,刘伶的狂放,都被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这些有的取自《世说新语》的描述,有的是从类书里得到的片影。对于他来说,纲常解纽的时代,知识人对于生死与功名有了另一种理解,而这种转向也决定了文章气象的不同。静止地看笔墨之迹的流变,反而是不得要领的。

在旧文献整理方面,他最为用心的是《嵇康集》的校勘,跨时有 23 年之久。如此长的时间沉浸在嵇康的诗文里,说是在寻找文章的变风也是对的。嵇康的文章与诗,都非彼时文人可及,自有高人之处。鲁迅欣赏他,大概因为其才气耀人,乐感、诗文均好,在文字里有多致的风采;又能够引用前人学术,打破儒家辞章的绵软之体,引老庄于诗文,通篇带有奇气;而面对邪恶政治显示的傲骨,对流行的思想加以反对,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限度。可以说,在鲁迅眼里,嵇康是风度有之,辞章亦高,全无俗儒的暮气。

《嵇康集》所呈现的文字,取自不同书籍。主要参考书有《太平广记》《文选》《世说新语》《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还从其他文献进行辑校补充。这些文章充满了高傲之气,远妄诞,近玄理,尚自然,

①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 532 页。

② 《谢无量文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6 页。

精神少有奴态。其中看出不凡的才华,那篇《琴赋》就“感天地以致和”,“寄言以广意”,意象大有庄子笔意。而《与山巨源绝交书》,则“情意敖散”,不堪于俗音,蔑视权贵,辩驳之语,笔带豪气。嵇康善作辩驳之文,《养生论》《答难养生论》是智者之言,斗士风采也是有的。既能疑古,又常出新。在生活里能够保持节操,于文章里则唱出悲壮之曲。嵇康所处时代,政治黑暗,文人受辱多多,在诱惑中仍不坠青云之志,精神的高洁反射出世俗的苍白。其诗文飘逸而不空幻,意象雄奇而暗含幽思,这些都是值得留意的部分。我们看鲁迅的杂文的犀利之语,也有与其相似的地方。由此也可以印证鲁迅何以欣赏其文字的深层原因。①

关于彼时的文风,《文心雕龙》有过形象的描述,刘勰以为“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②,鲁迅对此是认同的。废名也认为那个时期文人作品“所谓生香真色人难学也”③,可见古今学人的感受多有相似的地方。其实鲁迅的表述中,与他们略有区别,既看重嵇康、阮籍的文字,更不忘他们的行为,以及这风度背后的悖谬。那代人的精神限度也是明显的,“竹林七贤”也无不如此。在反复对比各种文本的时候,能发现众人作品其实也有矛盾的地方,像嵇康在面对复杂现象时的心得,也有反逻辑的心不由衷的一面。不看到他的悖谬与限度,要走进内心深处也是难的。

“竹林七贤”里的人并不一样,阅读刘伶《酒德颂》和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咏史》,以及向秀《思旧赋》,会体察出那些人的差异。鲁迅感受到了一种不自由的自由,文人的狂放背后,也有难言之隐。他说阮籍的诗写到神仙,而自己并不信那些存在。这和曹植贬低文学,其实另有所指一样,乃个体精神在环境里不得舒展的一种变形体现。“竹林七贤”的文字常有思想的埋伏,他们的美丽的辞章其实与失败感是连为一体的,所以向秀说嵇康“寄余命于寸阴”,乃一种生命的挣扎。士人风度最可感者,便是这种“傲世忘荣”的态度,忧愤而不失峻伟之姿,骎骎然于无路之途,命危而后文聪。鲁迅说后人不易学到他们的真髓,原因是没有悟到那华章后的隐秘。善于从词语中看到作者的策略和精神破绽,是思想者的特点之一,西洋人对此有不少论述。海德格尔关于“存有”与“语言”的思考里,涉及“遮蔽之澄明”的话题,就与鲁迅的体悟有异曲同工之妙。④

如此表述魏晋风度,除了与文本的呼应外,也有五四后新文学的价值取向在里面。新文学运动中,对话性、批判性与创造性,乃鲁迅等人的一种自觉的追求。魏晋文人的选择中的超俗性引起自己的共鸣也是自然的。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发表之前,与章士钊、陈源等人的论辩,以及《野草》中神异的精神表述,未尝没有嵇康的痕迹,在一个昏暗的年代抗拒着阴冷的魔影,使鲁迅真的体味到了古代文人的真髓。魏晋之后,文人难见叛逆之姿,李白崇尚建安风骨,也不是没有原因,苏轼就发现了李白诗中的精神背景,在一个不如意的时代保持心绪的放达,实在是难矣哉的事情。⑤ 五四那代人重温魏晋的风尚,常常也如李白、苏轼一样,有着“终古虽远,旷焉如面”⑥的亲切感。

五

但阮籍、嵇康提供的是精英文本,那是认识彼时思想者的标本之一,而民间非精英的表述,街巷里的野性词语,对于鲁迅的价值可能更大。在介入魏晋文化的考察中,《古小说钩沉》是很重要的学术收获,

---

① 关于鲁迅与魏晋文学关系,刘半农与废名都有论述,刘半农曾送鲁迅一幅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参见孙伏园、孙福熙:《孙氏兄弟谈鲁迅》,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5 页。

② 《文心雕龙·才略》。

③ 止庵编:《废名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5 页。

④ 马丁·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96 页。

⑤ 苏轼在《书太白广武战场诗》中,曾指出李白气韵与魏晋文学的关系,文中有颇多体悟。《苏轼文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121 页。

⑥ 《文心雕龙·时序》。

对于他认识古代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提供了有趣的镜像,这些并没有进入晚清一些学者的视野里。从辑录文本中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的小说,形态并不成熟,稚气与简单化,影响了传播。不过,旧时的表述有几点可能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一是语言都很简朴,没有雕琢之迹,用语与日常口语接近,传神的地方是从自然语态里流出来的;二是注重人情,即便是志怪,也带着民间的普遍心绪,眷恋生命,惊异于世间的无常;三是民间传说的记录,虽有佛教痕迹,但根底还是儒、道的东西最多。因为有生死之思,帝王的生活也与常人相近,并没有都去神化帝王之迹。这里无意间折射了民间的某些观念,虽然很弱,但依稀可见古人的精神层次。

《古小说钩沉》涉及的内容极为驳杂,主要是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太平御览》《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广记》《艺文类聚》《太平寰宇记》《白孔六帖》《法苑珠林》《事类赋》等文献中辑录出来的,这些散佚的文本包括《青史子》《语林》《郭子》《笑林》《俗说》《小说》《水饰》《列异传》《古异传》《甄异传》《述异记》《灵鬼志》《志怪》《神怪录》《神录》《齐谐记》《幽明录》等①。总体看来,所辑作品在文体上没有太大亮点,但内蕴却是社会学家最关注的。士大夫诗文所记录的社会风气,心理状态,都于此见出一二,也有人间百图的意味。一些作品记录了台阁间权力文化的幽暗,如《汉武故事》所叙君臣之序,血腥与智慧均有,看出文化里主奴之态。一些作品叙述了战乱的社会百姓的无奈中的期冀,如《幽明录》所载永嘉之乱的故事,一女子彭娥与贼相搏,被俘后贼欲杀之,行至山边,仰天而呼,天地为之所感,山忽然开出平路,彭娥逃之,众贼悉被崩裂的山石所埋。彭娥隐而不出,所遗器物化为石形。这种想象,后来在许多民间故事里曾被借用,惨烈里的柳暗花明,抚慰着苍生的心。《古小说钩沉》还辑录了一些因果报应,民间禁忌的故事。生死礼节,厚葬之风,沙门、巫师、土地神、道人等形影也忽隐忽现,民间冷热悉出其间,笔墨里残存着不尽的谣俗趣味。

在众多文本里,志怪与录异的内容颇多风致。所辑校的《搜神记》《志怪》《鬼神列传》《志怪记》《异林》《齐谐记》《冥祥记》《宣验记》,就多了恍兮惚兮的片影,作者的信仰之语历历,故事多与佛教有关,情节复杂了许多。此类叙述,比起《世说新语》要跌宕缠绕,阴阳两界,善恶之迹,在佛门间有了另类表现。诸多故事讲述的是信佛免灾、诚挚得报的道理。其中晋代会稽的旧事中,生老病死间的行踪,不乏佛教余音,释迦牟尼思想如何被世俗化,藏在字里行间。会稽百姓凡信佛者,食素、诵经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大凡做到此点,即使遇到不测,也能化凶为吉。沙门故事尤有离奇者,死前之幻觉,地狱边之神启,有时演绎得楚楚动人。这类的文字,从某种层面注释了时代的思想变迁之迹,考其来龙去脉,当看到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侧面。鲁迅后来所作小说《祝福》写到民间对于鬼魂的态度,不妨说受到了这类意象的暗示。

离奇古怪的故事吸引人的地方自然有超现实的元素,但现实本身存在的荒谬,也决定了那文本的隐曲。残存在类书里志人小说,颇多可观之处,这些在《古小说钩沉》里也占很大比例。主要集中在《语林》《郭子》《笑林》《水饰》《小说》《汉武故事》等小辑中。所录的文字,多文人行迹,短小篇幅里,人物形影活灵活现,笔锋传神,语意纷繁。像嵇康弹琴之姿,刘伶饮酒之状,王羲之笔墨之意,都飘然纸上。王子猷雪夜因读左思之诗,忽念及友人戴安道,便乘舟造访,及至,未能敲门而入,遂兴尽而返。此类故事,心绪,风景,人影,情怀均出神入化,洒脱之状,看出自如无累之气。鲁迅从别类文本里发现了与《世说新语》相似的故事,在辑校中对比文体与意象,精神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也易引人想到思想传播的各种路径。②

---

① 林辰《关于〈古小说钩沉〉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一文,有详细的考证。参见《林辰文集》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1—134 页。

② 鲁迅在一些文本里发现了与《世说新语》接近的故事,但叙述方式略有区别。这对于了解魏晋时期故事的流传,提供了有趣的视角。

分析《古小说钩沉》众多文本,志怪与志人,是主要的形态,这两者,构成了文人审美的两面。前者时空是变动、扭曲的,引发了后世小说的进化;后者则成为古代士的各种侧影,偶尔能感受到市井的流光。在支离破碎的文献里,偶能透视到文学与社会生态的复杂线索,这些为后来的创作和研究小说史,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性资料。他的小说《铸剑》就取材于《列异传》和《搜神记》片段,由此演绎出惊世骇俗的故事。而诸多文献资料,也引起了对于陌生化存在的思考。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六朝的志怪小说发达,是印度文化影响所致:“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怪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①魏晋小说在审美上有奇异的地方很多,有学者指出:“《列异传》写了鬼神妖怪,但叙述中却较少鬼气妖气。”②鲁迅其实在清末绍剧中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对照中的联想,也见到了艺术演变的轨迹。志人小说与志怪作品不同,“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这有宋刘义庆做的《世说新语》,可以做代表”③。所谓志人,也非平庸之态,多为行迹奇异之色。放达,飘逸,独绝,被一一记载。鲁迅认为,这些“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④。可见,在整理古代文献的过程,受益最多的是小说史料,它包罗众象,仪态万千,虽为初始时期的文本,但已经隐含了精神表达的诸多可能。在此也体会到了历代文论家忽略的审美趣味,这是现代人才会拥有的眼光。那些沉睡的文本,也被他后来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了。

六

近代以来的学人讨论魏晋文化,思路各异,并不是人人都有文脉概念。例如,同样是描写陶渊明,梁启超与陈寅恪的角度不同,周作人和废名心得不一。周氏兄弟后来围绕文学生态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他们的共同点是承认旧文学里的民俗意义,但对于士人的态度,则有迥异的地方。周作人常常把陶渊明前后的审美思潮与古希腊文学超功利的意蕴联系起来,废名、朱光潜讨论同一话题的过程,也持类似的观点。将古人经验凝固于一体,高悬为无功利的纯然之物时,鲁迅以为遗漏了重要的精神。所以他对于周作人为首的京派学人的审美观念一向不以为然。而南下后关于传统文学的议论,背后是有着复杂的问题意识在的。

与同代读书人不同,鲁迅研究古代诗文,受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经验的暗示,即从制度与风气的层面看文学的生成。汉代文学是发达的,鲁迅虽然欣赏司马相如,但也看出写作里亦带俗意,即也是帮闲于帝王。⑤ 文章背后的这层意图不了解,对于文学史的把握就仍是隔膜的。在许多地方,他谈到了曹氏父子的笔墨,但都不是从纯粹的文章学层面为之,在分析曹子建“文章是小道”的观点时,看出其叙述的圈套,以为是掩埋了思想深处的本然之意:“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⑥这种从政治角度认识文本的本领,是他在“文明批评”中渐渐形成的。

鲁迅讨论嵇康的诗文,除了看重其文气与才学外,也意识到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看汉魏之后的作品,有一个非文学的视野,知道文章之发生,除了是继承传统之外,现实的刺激可能更为重要。比如清峻的风格如何形成,鲁迅以为与专制的统治有关:

>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

① 《鲁迅全集》第九卷,第 318 页。
② 石昌渝:《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2 页。
③ 《鲁迅全集》第九卷,第 319 页。
④ 《鲁迅全集》第九卷,第 319 页。
⑤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356 页。
⑥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 526 页。

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①

这个判断的背后,可能也有自己在教育部工作的体味在起作用,知道政客的行为如何激怒了文人,在复杂的问题面前,政治使人的言行出现逆反现象。而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从存在出发,看人的精神的多面性与矛盾性。无论克尔凯廓尔还是施蒂纳,都能在现存环境体味思想的不确定性,荒诞的感受也是有的,从旧的文字描述里看出悖反的现象。他说:

>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②

这是跳出文人视角的审视,在文本背后见到许多被掩饰的存在。他所译介的阿尔志跋绥夫、迦尔旬、安特莱夫的作品,亦有此类特点。于平静里听见轰响,在简约中发现复杂。鲁迅觉得文学作品要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是颇为困难的,倘不据环境和言论的体系生成的原因细细思量,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古代文人生活,吊诡的一面颇多,文学的各种形态折射出社会多面性与难以言说性。生死之辨与荣辱之别藏着无量之苦,而文本造成了一种假象。虽然超脱之人多多,但背后是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在的。文人的笔下,悠然的部分多是幻影,谁也难以摆脱残酷政治的影响。而这时候文学的功用也非超脱:

>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③

上述的话,既有抄写史料时的心得,也与其对当下时局的感受有关,域外文学批评的思想,自然也起到了提示作用。早在北京时期,就译介了厨川白村、有岛五郎等人的文学批评的文字,那些作品都紧贴着现实,并非超现实的梦语。1926 年,他一连翻译了多篇文学批评的文章,几乎都涉及了诗文背后的政治元素。像日本中泽临川、生田长江《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就提出"和虚无战是生命"的概念,文学的直面现实的一面,展示得颇为生动。俄国的托洛茨基那篇《亚历山大·勃洛克》,显出诗人鲜活的文字藏有的易代之际改变世界的冲动,在鲁迅那里是难忘的书写。他在翻译此文后,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了另类的理解。而在接触了德国左翼批评家的文本后,体味诗文的视角也变得丰富起来。这些外来的艺术理论与自己的生命经验汇合一起,连带整理古代史料的心得,便形成一种流动的、鲜活的意识。他在透视古代文学的生成过程里,将思考问题的方式变得立体化了。

但是这种心得,许多时候也被象牙塔里的学者所误解。晚年鲁迅的言论中,古代话题的背后其实是当下文化难题的显现。考其原因,一是现实的残酷产生了古今对比之意,二是不满意于远离现实的京派学者的审美意识。京派的学者在许多地方与鲁迅距离甚远,尤其周作人周围的学者的言论,在鲁迅看来,不仅误读了古人,也误读了现实。他的文章多次批评了象牙塔文人对于现实的隔膜。1934 年 5 月所写《儒术》一文,提及儒门读书人在乱世的处世哲学,引用《颜氏家训》的资料嘲讽士大夫的苟活意识,内含着对周作人批评之意;次年所作《"题未定"草(六至九)》讨论陶渊明的作品,直接矫正了朱光潜的审美偏差,以为全面理解作家的作品殊为重要。"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④文中还谈及南朝齐诗人谢朓《谢宣城集》,认为"这样的集子最

①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 524 页。
②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 535 页。
③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 538 页。
④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444 页。

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①。京派学者在许多领域不能与现实有效对话,那时候周作人、废名、朱光潜等人的审美意识,忽视的恰是从复杂文脉里寻找精神原色。他们远离左翼文化,也是知识兴趣的不同决定的。鲁迅的“暗功夫”冲击了他们的精神围墙,论争里带出的震动,与其说是对古人的重新发现,毋宁说是批判理性在新文学里的一次绽放。

这是显然的:鲁迅体味魏晋文脉的时候,在前期呼应了疏离桐城派的思潮,重个性,远道统,彰显着一种创造精神;后期则有精神界战士的内力,质疑“纯粹的审美静观”的破绽,审美判断里没有脱离时代语境,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收入眼底,故凝视文本的时候,看到的是社会风气的流转,明暗的聚散。一切文学,都是社会存在的折射,诗文的想象与创造性的表达,也留有时代痕迹。这个看法,与勃兰兑斯、厨川白村、普列汉诺夫的文学思想很像。鲁迅借用不同的资源,激活了传统有意味的部分,他的论述性的文字至今还散着热度,乃因为切入了社会的机体和人性的深处,作家的感觉与学者的见识互为参照,其文学史观念就有了弦外之音,和别样的寄托了。

Lu Xun's Way to Understand the Train of Literary Thought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Yu S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editing and collated literary documents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Lu Xun (鲁迅) discovered the concealed contextual message in the train of literary thought from these documents. From his hometown literary documents (乡邦文献), the celebrated scholars' quotations (名士语录), and the spirit of their writings, Lu Xun captured various possible ways of spiritual expressions. All kinds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he secured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not only stimulated his academic thinking and literary creations, but also brought his sense of reality into his gaze at ancient poems and writings. While he connected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ith his contemporary era, he built up his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references from foreign materials. With his extraordinary view, he further rectified some aesthetic concepts of Beijing-based scholars.

Key words: Lu Xun (鲁迅), Wei and Jin Dynasties, hometown literary document, Beijing-based Academic School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 444 页。